

再谈殷墟卜用甲骨的来源

宋镇豪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晚商王朝甲骨占卜盛行, 李济先生总结殷墟前六次考古发掘时曾提到: “占卜以甲骨, 遗留下来的, 以无文字记载者为多, 有文字者不过十分之一。甲以腹甲为多, 背甲参用; 骨以牛肩胛骨为多, 羊、鹿肩胛骨参用”^①。而历年以来又发现有用牛肋骨、牛距骨、牛头骨、鹿头骨、鹿角器、兕骨、虎骨、鳖甲、象肩胛骨、人头骨等占卜或者刻辞记事。70 年代小屯南地又出土比较少见的猪肩胛骨卜辞^②, 近年殷墟苗圃北地还出土用人髌骨占卜的材料^③, 均极不多见。然而殷商王朝占卜所用骨料的大宗, 主要还是采用牛肩胛骨和龟腹甲。

晚商王朝甲骨占卜用量甚巨, 昔胡厚宣师在《殷代卜龟之来源》一文中, 曾就殷墟甲骨发现后四十余年间的龟甲与卜骨出土数量进行了大略统计, 推得有字龟甲数为 80015 片, 有字卜骨数为 29595 片; 并指出“历来被弃而不取之无字甲骨, 数量实多。又此外未经用过之甲骨原料, 亦颇不少。”这些无字甲骨, “其至少亦当与有字者数量相等”, 那么“合有字甲骨与无字甲骨两者计之, 其数量当为: 甲 160030、骨 59190”; 由于“甲骨多属残碎”, 若“以龟甲十片为一全龟, 兽骨五片为一副胛骨”推算之, 则最低限度约数, “龟 16003、骨 11858”个。胡厚宣师又从《铁云藏龟》等二十余种甲骨文著录书及若干未著录材料, 统计得卜辞中的牛祭数约“至少当在 9374 头以上”, 认为“牛祭之后, 除沉牛于河, 埋牛于地, 燎牛于火之外, 其胛骨当存之以备占卜之用。”另外甲骨文中记贡龟之数于甲桥、甲尾、背甲等部位者, 如贡龟千者一次, 贡龟 500、300 者各 2 次, 贡龟 250 者 12 次, 100 者 15 次, 50 者 16 次, 10 者 59 次, 等等, 统计得“贡龟共 491 次, 凡贡 12334 版”, “与前所言 16003 之数, 相去固不甚远”^④。

但正如胡厚宣师同时所顾虑到的, 甲骨文中贡龟数的统计法, “亦难免有不甚合理之处, 如同一人同一数目之多次贡龟, 其为一次贡龟之多次记载, 抑为多次贡龟之每一记载, 或其中既有一次贡龟之多次记载, 又有多次贡龟之每一记载, 实不可知。”董作宾先生正持有此类批评意见, 他把甲桥、背甲刻辞中的同文贡龟数算作同时贡龟, 例如甲桥刻辞“雀入二百五十”, 在《乙编》共有 7 见, “由于龟版大小略等, 知道是某地所产的同种的龟”, “这只是一次的贡纳, 而不是贡纳七次, 每次二百五十”^⑤。这一入一出, 其间的统计数相差达 1500 个。日本白川静教授也持相同看法, 他指出, 《乙编》中有 4 例甲桥刻辞“我氏(以)千”, 其龟类均是同种的小形龟, 推测并不是表示得了好几次千龟, 若照胡厚宣师的计算, 盖要合计为 4 千龟, 然而像董氏把数目相同的龟全算成同时者, 也十分冒险, 如《乙编》记“莫来十”的有 4 例, 龟的大小差异很大, 未必是一批的贡物^⑥。总之, 甲骨文贡龟数的计算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近刘一曼先生在《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地及其相关问题》^⑦一文, 对殷墟历年考古发掘出土甲骨作了最新的统计, 自 1928 至 1937 年, 小屯、侯家庄、后岗 3 地发掘出土字甲 25391、字骨 3184, 合计 28575 片, 无字甲骨不详; 自 1950 至 1991 年, 殷墟小屯、花园庄、孝民屯、北辛庄、梅园庄、四盘磨、白家坟、张家坟、王裕口、薛家庄、苗圃、后冈、大司空村等 22 个地点, 考古出土无字卜骨 5973、无字卜甲 1690、字骨 5604、字甲 662, 合计 13931 片; 总而计之, 有字无字卜骨数为 14763、有字无字卜甲数为 27743、合两者之数 42506 片。即使不计历年盗掘出土的传世品, 其数量也确实“骇人听闻”。

晚商王朝卜用甲骨数量之高如此惊人, 又都来之何方呢? 胡厚宣师曾经依据有关甲骨卜辞及先秦文献资料, 指出“殷代之卜龟, 盖由南方西方之长江流域而来, 尤来自南方者为多”, 并认为“殷代与南方之长江流域或更以南, 必已有繁盛之交通, 乃广取龟甲而用之”^⑧。今之甲骨文有云:

庚申令犬雉来, 犬以龟二, 若, 令。(《合集》21562)

1999-04-21

卯来十、崑百。(《合集》9188反,即,《山博》0244)

□亥入五十[鬯]。帚井乞鬯自□七,耳十五(《合集》9395)

贞□来王,佳来。允至,以龟:鬯八,卷五百十。四月。

王国曰:佳来。(《合集》8996正反)

以上4辞,涉及龟甲的入贡来源、数量及龟的种类。辞中的“以”读如“致”,贡纳、致送、征取之意,义同“入”。“来”亦指入贡之事。入贡的龟数,或数龟,或数十龟、或百龟至五百十八龟不等。“帚井乞鬯自□七,耳十五”,乞为乞求、收取之意,盖指入贡的总五十个鬯数中,有两批若干个,是帚井分别从某与耳二人处收取来的。合以上4辞所见,知殷人已有不同龟种的区分。龟的入贡,又有言其来源地包括数量者,如:

贞龟不其南以。(《合集》8994)

出来自南以龟。(《乙》6670)

戊戌卜,鼓,贞引祀,六来龟三。(《合集》9185)

…西…龟。一月。(《合集》9001)

周入。(甲桥刻辞,《合集》6649甲反)

我以千。(甲桥刻辞,《合集》9013反)

雀入龟五百。(甲桥刻辞,《合集》9774反)

竹入十。(甲桥刻辞,《合集》902反)

唐入十。(甲桥刻辞,《合集》9811反)

唐来十。(甲桥刻辞,《丙》56反)

羌入五。(甲桥刻辞,《合集》13648反)

斐入百。(甲桥刻辞,《合集》12102反)

帚好入五十。(甲桥刻辞,《合集》10133反)

莫来五。(甲桥刻辞,《合集》10345反)

臣大入一。(甲桥刻辞,《丙》33反)

且单看上辞中有关龟的产地或来源,来自南方和西方皆已明指。另外上揭一批甲桥刻辞,是刻于龟腹甲反面两边突出的甲桥部的文字,所记内容大都是关于该批卜用龟甲从何处入贡来的;贡龟者,如“周入”,记周方贡龟,周地处黄河上游陕西一带,位于商王朝之西部。“雀入龟五百”,丁山、郑杰祥氏均以为雀地在今河南郑州西郊荥泽附近,即《穆天子传》之“雀梁”^⑨,位于安阳殷墟的西南面,广义上讲也可说是西方来龟。日本岛邦男先生以为雀的领地在殷的西方^⑩。钟柏生先生以为雀的地望在今山西西南部或河南省西北部^⑪,即黄河弯道附近。凡此亦可为西方来龟之证。《逸周书·王会篇》有云:“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正西…神龟为献。”是知上古时所谓西方的黄河流域中上游地区确产龟。又《文选·蜀都赋》注引谯周《异物志》云:“涪陵多大龟,其甲可以卜。”则西部长江流域四川地区同样也产龟。又上揭甲骨卜辞“六来龟三”,据饶宗颐先生考释云:“按六为地名。《春秋》文五年,‘楚人灭六。’今安徽六安地,正在殷之南土。证之《禹贡》:‘九江纳(《夏本纪》作入)锡大龟。’《鲁颂·泮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元龟象齿,大赂南金。’元龟象齿皆淮夷所献”^⑫。齐文心先生认为,“六”是商的封国,在江淮之间,今安徽六安地,位于商“南土”的东南方^⑬。此可为南方江淮地区来龟之证。《国语·楚语》云:楚国云梦泽产“龟珠角齿”。今本《竹书纪年》谓周厉王元年“楚人来献龟贝。”《庄子·秋水》云:“吾闻楚有神龟。”《史记·龟策列传》云:“神龟出于江水中,庐江郡常岁时生龟,长尺二寸者二十枚,输之太卜官。”这些文献记载都是讲南方长江流域产龟,而以楚地为盛。

由此可知,殷代之卜龟未必如过去学者所说,皆由南方、西方之长江流域而来,实质上西方黄河流域中上游亦产龟。再者,上揭甲桥刻辞“竹入十”,竹为殷商王朝北土的侯国,记竹国入贡了十龟。别辞有称“竹侯”(《合集》3324)。严一萍先生以为竹国即《史记·秦本纪》“齐桓公伐山戎,次於孤竹”,《正义》引《括地志》云:“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十二里,殷时诸侯国也。”址在今河北卢龙、抚宁县一带^⑭。李学勤、彭邦炯先生说同^⑮。再如“唐来十”、“羌入五”,两地或在山西中部,则大抵是殷西北来龟。“斐入百”,胡厚宣师以为在山东临淄之西北,即孟子去齐宿卫之处^⑯,东方亦贡龟。而入龟者帚好、莫、臣大等,其领地当在王畿一带,可推知殷

商王朝辖区内也自产龟。殷代卜龟的来源应该说是多元的,严一萍先生即曾指出,言殷代卜用之龟必从南方西方而来,“事实上也不尽然”。今从考古遗址可以看到,位于殷都北方的河北磁县下七垣遗址①⑦、藁城台西商代遗址①⑧、邢台地区的商代遗址等,皆有不少卜用龟甲出土,时代可早到中商。远在北京的琉璃河燕都①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也均有卜龟发现。这些卜龟很难说不是当地所产。其中邢台处于上述竹国与中原殷商王朝交通孔道之间,邢台北去,还可抵达殷代曼国即后来西周召公所封北京琉璃河之蓟都一带。殷墟甲骨文又云:“妇姁示五屯”(《合集》6177)、“姁来牛”(《合集》9178),是有关曼国与中原殷商王朝已有通婚、进贡牛牲或卜骨之往来。《本草衍义》云:“秦龟即生于秦者,秦地山中多老龟,极大而寿。龟用即非止秦地有。四方皆有之,但取秦地所出大者为胜。今河北独流钓台甚多。”可见不特西方产龟,北方也产龟。而殷商东方的山东,更有滕县安上村遗址、济南大辛庄遗址、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铜山丘湾遗址等,也都有龟甲出土。正如严一萍先生所指出的,“殷商王朝所用的龟甲,从东方北方来的,也并不是不可能”②⑩。

生物学家对安阳殷墟出土的龟甲有过几次鉴定,秉志先生《河南安阳之龟壳》一文②⑪,是最早的鉴定报告,指出殷墟第三次考古发掘所得一完整龟甲之构造,“与希腊田龟(*Testudo cracca*)相似,兹特定名为安阳田龟(*Testudo Anyangensis*)”,但对于卜龟的来源,是安阳本地产,抑或是三千年前殷人得自他处,则持审慎态度,认为“尚须於河南之动物及化石详细调查,然后可得而言之”。其后卞美年先生又有《河南安阳遗龟》②⑫的另一次鉴定报告,对于这块殷墟出土龟甲实物,定其学名为中国胶龟(*Ocadia sinensis*),报告中指出:“中国胶龟(*Ocadia sinensis*)与地龟(? *Geoclemys reevesii*)都是现在尚存的种类。前者仅产于南方(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和台湾),而后者则是很广泛地产于中国,并常有人工培养。后者的化石曾在周口店(第三地点)的下层(即初期)更新统层中出现过。”从这份报告上看,他主要还是针对所鉴定的实物标本而言,确定了殷墟龟甲有从南方输入者,但并没有排除有其他地方包括安阳本地出产之龟。1936年殷墟第十三次发掘YH127坑,伍献文先生对其中最大一版长44、宽35厘米、背后有204个钻凿的龟腹甲(见《乙》4330+4773,又《合集》14659)也作了鉴定,他参照英国葛莱(Gray)氏的大英博物馆《龟类志》(*Catalogue of Tortoises*),指出此版大龟与现在产于马来半岛的龟类是同种②⑬。董作宾先生曾总结说,殷墟龟甲的鉴定,除伍献文“考得今马来半岛有此种”外,“吾人发掘所得之龟甲,大小不同,来源不一,而秉志所研讨之安阳田龟,确可为一般卜用龟甲之代表品”②⑭。这说明,过去对殷墟龟甲鉴定出了两类,一类是安阳田龟(*Testudo Anyangensis*),属中小之龟,其中恐怕主要来自本地;另一类是中国胶龟(*Ocadia sinensis*),取样是长44厘米左右的大龟,属于特殊的名龟,系南方长江流域或南方更远的海域输入。美国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教授《Sources of Shang History: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of Bronze Age China》②⑮一书,附录一收贝利(James F. Berry)撰《商代龟甲的鉴定》一文,又认为这是今缅甸及印度尼西亚一带出产的龟种(*Geochylene (Testudo) Emys*)。这些鉴定意见,对于了解殷代卜龟之来源极有启示,与甲骨刻辞记龟甲来源之多元性也是相适应的。

近刘一曼先生指出,殷墟不同的遗址所出的卜甲数量、大小有不同,比如说,小屯出的卜甲最多,数以万计,大的卜甲也多,最大的长44厘米,侯家庄南地的大龟七版长27-29厘米,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出土卜甲一千五百多版,大甲的数量也不少,最大的卜甲长约34.5厘米。考其原因,一是“卜甲的占卜主体的身分不同”,二是“与龟甲的来源有关”,王卜用之龟大多属各地的贡品,尤其是大卜龟,盖与青铜礼器一样,乃是等级、权力、地位的一种标志物,而平民或小贵族则一般用本地或附近产的尺寸较小的龟②⑯。

再就是殷墟卜骨的来源,胡厚宣师认为,殷代北方多牛,畜牛极盛,牛祭最多一次有用千头者,许多牛牲的“胛骨当存之以备占卜之用”②⑰。50年代初陈梦家先生曾经向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请教殷墟卜用兽骨的种属,1953年3月12日杨氏函复云:

(1)用作占卜的肩胛骨,各种动物都有:如鹿(不同的鹿)、马、猪、羊、牛等。不过肩胛骨一作占卜之用或刻上文字之后,出土时往往残缺,不容易辨别它是属于那一种动物的肩胛骨。因之,只能个别的判定。

(2)肋骨的使用除牛以外也用其他动物的,如鹿等。肋骨一经截断成小节之后,很难鉴定出它的属别。牛肋骨更不容易分别出是属于那一种牛的。

(3)上属的牛当然包括两种牛,即牛 *Bos exiguus* Mats 和圣水牛 *Bubalus mephistopheles* Hopw。它们只有习性上的区别:牛是在野田中生活的,水牛能在池沼中生活而不大习惯于田野或山地。当初的用途如何,无从知

道^⑧。

杨氏早年曾对安阳殷墟出土哺乳动物遗骸有过细致的鉴定分析^⑨，他指出当时卜用之肩胛骨，“各种动物都有”，这是出于他实际研究所得，是可信的，故陈梦家即结合杨氏此说云：“安阳殷墟发掘所得的卜用肩胛骨，固以牛骨占最大多数，但也有少数的羊、鹿和猪、马的肩胛骨。”

然而，这里也有必要指出，据我们所知，自史前以来，尚未发现有用马肩胛骨作占卜材料的，尽管殷墟出土马骨甚多，用作卜骨的却从未真正找到过，所谓“用作占卜的肩胛骨，各种动物都有”，因并非出于“个别的判定”，只是泛泛讲来，恐怕还是应该把马肩胛骨排除在外。董作宾先生说过，卜用之肩胛骨，“我们也但凭直觉，小一种的，应该属于鹿、羊之类；较大的，普通都是牛胛骨。是水牛或黄牛，也是不易分别的”^⑩。即使殷墟出土的牛肩胛骨看，也自有大小之分，最大的一版，见诸《殷契拾掇》2·159片，又见《合集》33747片，为一右胛骨，通长42、宽24厘米。稍小一点的，如《屯南》2307一版，长37、宽23厘米；《屯南》2180一版，长32、宽18厘米。牛肩胛骨的大小之别，除取决于牛龄诸因素外，可能还与种属方面有关，即上述杨氏说的“包括两种牛”。俗谓黄牛的肩胛骨狭而长，水牛的肩胛骨骨扇宽大，这对殷墟卜用牛肩胛骨大小的区分也许是个启示。昔罗振玉疑“卜用之骨有绝大者，殆亦象骨”^⑪。王襄也说过：“甲辰乙巳间，日间课余始治其甲骨文字，知此骨有龟甲象骨二种，乃古占卜之用品”^⑫。对此，董作宾先生指出，台湾大学理学院动物学系所藏象骨全幅标本，其胛骨作三角形，而“向来著录的大胛骨卜辞的拓本，都是近于‘长方形’，绝对没有全骨近于‘三角形’的”，故罗氏《殷墟书契菁华》四版大胛骨，绝非象骨”^⑬。这话不错，不过，虽说罗氏之骨乃牛肩胛骨，但殷墟还是出有十分鲜见之象胛骨卜骨，已故金祥恒先生复又揭出一片象胛骨刻辞^⑭。原片今藏沈阳市辽宁省博物馆，摹本收入《甲骨续存》下篇第390号正反，拓本著录于《合集》13758正反，正面有卜辞“己巳卜争贞王舟……”一条，反面有“己巳卜贞殷亡疾。贞王其往田其雨。”属武丁时卜骨。金氏根据“象肩胛骨略呈‘三角形’，而牛肩胛骨则近于‘长方形’”的生物骨骼标本特征，指出此骨之大小形状，“骨白部分特大，骨面略成‘三角形’，异于近似长方形之牛肩胛骨”，故推断“此片为象肩胛骨刻辞”。这种“三角形”肩胛骨在殷墟出土甲骨文材料中仅此一见。如果说法属实，知殷人不仅利用象骨、象牙制作名器，且亦偶尔有用于占卜场合者。

概言之，殷墟出土的卜骨，鹿、猪、羊、牛、象各种动物的胛骨都有，而没有马卜骨发现，其数量最多的则为牛肩胛卜骨，过去所传的象胛骨虽只是水牛肩胛骨的实例，但仍难排除殷人有象卜骨之说。这些卜骨的来源，有猎自野生的，但主要当来之畜养，有着可靠的来源保障。甲骨文有云“降咎千牛”（《合集》1027），又有云“禽见（献）百牛”（《合集》102），前者指把牛补充入牢棚饲养备祭用，后者指牛牲的贡入，此类牛的肩胛骨皆可用作占卜，是知卜骨既有来之畜牧牲口，又有自他方贡纳来的。卜骨来源的多元性颇与卜龟相类似，但卜骨主要产地是在中原及北方地区，卜龟的产地却分布地域广大，有来之南方江淮流域的，有来之黄河流域东西方地区的，有来之北方地区的，甚至有南方长江流域更远的海域输入的，而安阳殷墟周围一带本地产的龟当也不在少数。

①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四册，1993年。又收入《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82页。

②此片猪肩胛骨卜辞现陈列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新楼二楼展厅。

③《1982—1984年安阳苗圃北地殷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1年第1期。

④见《甲骨学商史论丛初编》第四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

⑤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序。

⑥白川静：《胡厚宣氏の商史研究——甲骨学商史论丛》（上、下），《立命馆文学》第102、103号，1953年。又宋镇豪日译中，见《甲骨学商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⑦见《考古》1997年第5期。

⑧胡厚宣氏：《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编》第四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

⑨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华书局，1988年，第125页。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21—223页。

- ⑩ 岛邦男著,温天河、李寿林译:《殷墟卜辞研究》,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第459页。
- ⑪ 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第187页。
- ⑫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上册,香港大学出版社,1959年,第38-39页。
- ⑬ 齐文心:《“六”为商之封国说》,《甲骨探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450-466页。
- ⑭ 严一萍:《甲骨学》上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年,第132-136页。
- ⑮ 李学勤:《试论孤竹》,《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2期。彭邦炯:《从商的竹国论及商代北疆诸氏》,《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
- ⑯ 胡厚宣师:《殷代封建制度》,《甲骨学商史论丛初编》第一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第6页。
- ⑰ 参见《磁县下七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2期。
- ⑱ 参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87-88页。
- ⑲ 参见《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6期。
- ⑳ 严一萍:《甲骨学》上册,第5页。
- ㉑ 英文报告本见《静生生物调查所汇报》第1卷13号,1930年。中文本见《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
- ㉒ M. N. Bien: On the Turtle Remains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of An Yang, honnan, 见《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17卷1号(Bull. Geol. Soc. China, Vol. XVII, No. 1), 1937年。
- ㉓ 伍献文:《‘武丁大龟’之腹甲》(Notes on the Plastron of Testuds Emys Schl. & Mull From the Ruins of Shsng Dynasty at Anyang),《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集刊》第14卷1-6期,1943年。又提要见《读书通讯》第79、80期合,1943年。
- ㉔ 董作宾:《甲骨实物之整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下册,1958年。又收入《董作宾学术论著》下册,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第1091-1108页。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3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又收入《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董作宾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505-523页。
- 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年,第160页。
- ㉖ 见《考古》1997年第5期。
- ㉗ 胡厚宣师:《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初编》第四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
- ㉘ 引自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页。
- ㉙ 参见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志丙种第十二号第一册,1936年。又杨钟健:《安阳殷墟独角羚羊之发现及其意义》,《田野考古报告》第三册,1948年。又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田野考古报告》第四册,1949年。
- ㉚ 见上揭董作宾:《甲骨实物之整理》。
- ㉛ 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初印本,1914年,第36下“象”字条。
- ㉜ 引自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页。
- ㉝ 董作宾:《大肩胛骨绝非象骨之证》,《中国文字》第3期,1961年。
- ㉞ 金祥恒:《甲骨文中的一片象胛骨刻辞》,《大陆杂志》第69卷4期,1984年。又收入《金祥恒先生全集》第二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90年。